书评•动态

兰阳论清史
——佛光大学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永江

2003年10月27- 11月3日，笔者参加了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并参加了会议期间和稍后在台北举行的两次有关《清史》纂修的座谈会。这几次会议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两岸学者间关于清史研究的专题学术会议，相信会对两岸未来的清史研究及国内已经上马的《清史》纂修工程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以下试就几次会议的有关情况作一综述，供同仁参考。

一

“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2003年10月27–29日在台湾东北部风光旖旎的阿玉山上召开。主办者佛光大学是台湾数年前才成立的一所佛教色彩浓郁的私立大学，位于宜兰县宜兰市郊的山上。山下是有名的兰阳平原，远眺则见波光浩淼的太平洋。由台北驱车到这里，须翻越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要整整三个半小时。会议的召集人是台湾著名的清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清史专家、满文专家陈捷先教授。陈先生多年执掌台大清史教席，桃李满天下，现在活跃在台湾学界的清史研究者，或多或少，都与他有渊源关系。近年，先生年事渐高，本已携眷移居加拿大颐养天年。听说去年是应新成立的佛光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之邀，回台主持该校的历史研究所的，我们因之得结此佛光论史之缘。说来这次会议本身也是一波三折。会议原定五月召开，因两岸相继爆发SARS，不得不一再推迟。8月25- 27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盛邀台湾学者出席，陈先生等13位清史学者与会。台湾学者由于受会期及参会学者人数等因素的限制，颇有言犹未尽之憾。于是即同编委会主任戴逸教授商定，在推迟到10月末的台湾会议上增加清史纂修议题，并敦请编委会的清史专家出席。于是，在各方的鼎力协助下，清史编委会由14人组成的代表团终于如期成行。

出席此次会议的学者，大陆方面除清史编委会的14名专家外，还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科院、北京市社科院、福建省社科院、广东省社科院、暨南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者20余人；台湾本土学者50余人；另外还有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学者6人，总计近百人的规模。会议收到论文60余篇，内容涉及清代学术文化、宫廷内府、清初政治、清代皇帝、清代档案、晚清史、郑成功与台湾史、八旗制度、边疆民族、宗教、治河、福建史与闽台关系、华侨、货币财政、海关、研究动态介绍及

[收稿日期] 2003- 12- 25
[作者简介] 张永江（1964—），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北京100872

清史纂修诸方面。三天的会议分为十个单元，在两个会场中同时进行。由于会议组织得力，内容虽多，却终于按计划有序完成。

二

以下按会议议程将研讨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开幕式 27 日上午举行，由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纪祥教授主持。照例由东道主佛光大学校长赵丽云女士致欢迎辞，接着是台湾学者张存武、美国学者韩小敏、日本学者细谷良夫、韩国学者辛胜夏作为贵宾，代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学者致辞。压轴戏则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的专题演讲——《纂修〈清史〉的缘起与方针——兼论清史的重要性》，戴先生的报告把大家带进了一个热烈的话题，同时为为期三天的清史讨论拉开了序幕。

第一场讨论是从学术史的视角展开的。两岸学者围绕《明史》、《清史稿》的纂修、孙承泽的学术生涯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从明、清史的纂修谈到了即将开始的大陆新清史的纂修，提出了很好的忠告和建议。

第二场讨论的主题是清代内务府和晚清史。关于前者，学者们依据现存的内务府档案，就清前期的宫廷绘画、工匠薪资、乾隆帝对宫廷匠人的态度、内务府满汉世家的比较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后者，问题集中在晚清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和对晚清史性质的认识上。

第三场讨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初的若干有争议的重要史事，如江南奏销案、清太祖“遗诏”、皇太极对索伦的用兵等等。二是围绕清代档案，如“清代档案学”的教学、清代科技档案的价值、赤峰收藏的满蒙文档案的价值发表了看法。

第四场第一部分是关于清代几个皇帝包括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咸丰诸帝的研究，涉及许多有趣的方面，如性格、爱好、血胤、信仰、为政风格等等，饶有兴味。尤其是陈捷先教授《康熙好色》的新论和郭成康教授关于乾隆帝的生母和诞生地的考辩，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另一部分报告则是围绕清代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外贸易展开的，包括 17 世纪广东与荷兰的关系，清朝收回台湾初期的台日贸易关系，晚清中国救助朝鲜难船方式等问题。另外，辛胜夏专门就韩国近年的清史研究动向作了介绍。

第五场讨论涉及的问题较多。首先是清代八旗制度，如清代对旗地的管理，清初京城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雍正时代对旗务的整饬等等，不乏新颖的见解。其次是关于清代的宗教问题，报告涉及到大汕禅师与清初澳门佛教，清末开封的犹太教问题。有关于清初靳辅治河的，也有回顾 1960—1980 年代台湾学术界纂修《清史》(国防研究院本) 和《清史稿校注》情况的报告。此外，杜家骥关于清代满蒙联姻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

第六场讨论的主题比较集中，一是清代边疆民族，二是关于郑芝龙和清朝统一台湾问题。关于前者，论题包括准噶尔政权与清朝奠定国家疆域的关系、康熙帝与多伦诺尔汇宗寺、乾隆年间清政府对新疆回民政策的变化、清朝的边疆统治与喀尔喀蒙古等等，反映了清朝边疆民族政策的多样性。后者则是清朝边疆史的另一个侧面——海疆史，而且直接论及清朝武力统一台湾问题。由于目前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和日趋紧张，使得这桩三百多年前的历史事件重被赋予了敏感性，学术讨论也染上了政治色彩。这一点从台湾学者的论题可以明显察觉到，如“郑芝龙对清郑和议之态度及影响”、“康熙如何统一台湾：近代台海‘两岸战和’关系的历史反思与批判”等，倒是大陆学者的视角，如“清军入闽与郑芝龙降清事考”，学术味更浓一些。

第七场报告分前后两段。前半部是关于福建地方宗族文化的，实际上也涉及到闽台关系。包括两篇报告，一是“清代泉州福全所的众姓合族”，二是“清代‘林日茂’家族文化研究”。关于众姓合族，陈支平教授将其定义为“在华南地区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家族内部血缘混杂和超越纯正血缘关系”的“家族联合体”，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乡族社会”与“家族”、“宗族”社会组织同样重要。有学者提出，“众姓合族”抑或“乡族”的概念与美国学者爱迪逊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接近，都

是一种“真实的虚构”。后半部是东道主为“清史纂修工程”安排的专场——两岸学者清史纂修座谈会。编纂委员会马大正教授受戴逸主任的委托，做了题为“开局顺利、任重道远——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10个月工作述要”的主题发言，话音甫落，与会学者特别是台湾学者就开始对感兴趣的问题发问、讨论。发言者中既有刚入清史门槛的青年学子，也有白发苍苍的学界耆宿，讨论范围涉及新《清史》的文体、字体（文言、白话；繁、简体），史书定位（是否官修正史），体裁形式（有无注释、考异，志的写法，如何统稿），史论关系，史书的功能，志的设置，直到具体内容的安排等等，有建议，有质疑，也有回应，有答辩，气氛热烈。在其他场次里，东道主也安排了有关清史纂修的发言，内容涉及清史纂修与外国的关系、清史纂修与档案整理利用，清史纂修与文献整理关系等方面。总的来看，对于重修清史这一中华民族的盛事，台湾学者是满怀热忱，倾心关注的，但由于两岸长达半个世纪的隔绝，学者们在意识形态特别是史学理念方面的差异不可谓小。沟通需要时间。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求同存异是可取的态度。

第八场讨论的主题是清代政治史，涉及的内容有清代的华侨政策、清代州县政治体制的特色、从《翁同　日记》中的语言考察“官常”与“权力”的关系等。其中，林文仁教授关于翁同　的解读视角令人耳目一新。翁同　贵为两代帝师，位极荣崇，但却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保守派。林文仁教授通过对其日记语言的解构，诠释了他的内心世界和清末的政治环境。

第九场报告也有两个主题：其一是清代经济史，有学者从清代盐价、银钱比价探讨了两淮盐商的成本利润及其没落的原因。也有学者分析了清初的海禁政策与平南王尚可喜的财政基础的关系，认为海禁政策导致海外贸易被禁绝，尚氏集团的财源大受影响，平南王遂成为海禁政策的反对者和取消海禁的推动者。还有学者通过对清乾隆年间货币的区域流通的研究，着重分析了清代货币政策与时空环境演变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学者对公司的源流作了考证。另一个主题是清代学术文化，涉及的问题有陈寅恪对清代史学的评论及其相关问题、对胡中藻《坚磨生诗钞》诗句的注解、对台湾故宫典藏《史馆档》中藩部表传史料价值的探讨等等。

第十场是最后一场报告会。一部分是关于台湾史的，报告的论题有“林则徐眼中的台湾”、“清乾嘉间吴沙在三貂之垦务”、“台湾传统建筑大木匠艺史料图文手稿架构之剖析”、“鹿港‘金门馆’史迹调查报告”，都是具体微观的研究。其余还有关于中国近代海关史料及重要研究的介绍、日本人对所谓“满洲”的认识、对清代八旗诗词的评价等等。

29日下午举行了闭幕式，龚书铎、中见立夫、戴晋新三位先生分别代表中国大陆、日本和中国台湾学术界致辞，佛光大学荣誉校长龚鹏程代表校方致闭幕辞。

三天的清史研讨会在当地社会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28日当地媒体宜兰电视台直播了对会议东道主李纪祥教授的采访。29日晚宜兰电视台的乡亲频道又特约大陆客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成崇德两教授和东道主陈捷先教授就《清史》编纂问题做了访谈。一些没有机会参加会议的当地学者自己找到会场，利用会议中间的茶叙机会与来自大陆的专家学者攀谈叙旧，话古讽今，令人感动。

三

在此次参加清史学术讨论会的学者当中，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代表团是引人注目的。这不仅是因为当今大陆清史研究的一些重量级的学者如戴逸、龚书铎等现身其中，还因为该团负有就《清史》编纂问题与台湾学者交流、讨论的重要使命。为此，在会议结束后的11月2日下午，两岸学者又一次在台北福华国际文教会馆举行了“两岸学者《清史》纂修座谈会”，会议由龚鹏程教授、戴逸教授主持，80余位台湾学者与会。会上，台湾学者畅所欲言，就清史纂修的各方面都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体裁体例。台湾学者对大陆方面进行的细致的体裁体例调研工作表示肯定，但具体意见则分为两派。一派主张顺应时代潮流，将

传统史书纪传体与现代现代章节体结合起来，吸收双方优点，开创新体，并寄厚望于新修《清史》能够成为后世史书的典范和表率。这和大陆清史编纂委员会专家的编纂思路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坚持传统正史体裁，认为此次纂修《清史》就是为了取代《清史稿》，是历代正史纂修传统的延续，理当固守传统纪传体体裁。实际上，大陆也有少数学者持此意见，不过多是受传统史学浸润较深的高龄学者，而台湾则是中年学者多。有的台湾学者主张，现在要做的工作不是重修《清史》，而是整修《清史》，即在《清史稿》的基础上做整修工作。也有的学者建议修两部，一部通史体；一部纪传体，保存史料。

二是关于现有的清史文献、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利用。学者们一致认为，新修《清史》要超越《清史稿》必须充分运用现存在大陆、台湾和海外其他地方档案馆、博物馆的清代原始档案和各种文献资料，尤其是分藏两岸的清代国史馆档案和清史馆的档案。台湾同行愿意合作及提供协助。同时，还必须广泛吸收现有的研究成果，如台湾历时多年完成的《清史稿校注》。

三是具体的纂修步骤、方法。台湾学者大多主张，正式撰稿前应先利用档案文献等做好典志、传记、史表等部分的史料长编。史料记载分歧的史事，要做考异。这样既可弥补史书因篇幅所限无法备载史实的缺憾，也可疑以存疑，推进清史研究。在写法上，许多人强调应该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去写，不作褒贬。同时避免预设结论，未审先判。注意最后稿件的审查、加工和统纂，使文字统一优美，保证史书质量。有的学者建议增修“纪事本末”。

四是关于编纂人员的培养。台湾学者认为，纂修清史与研究不同，需要有专门的写史技巧和才能。因此编修清史人才的培养很关键。这一点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这次座谈会再次表明，台湾清史学界很关注清史工程。尽管双方在不少问题上仍有分歧，如体例方面是否保留本纪，是否抛开意识形态，通纪如何划分阶段，传记如何分类妥当等等，但许多人以各种方式表示愿意参与其事，共襄盛举。因为这毕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事业。

(上接第 82 页)

⑮道光五年《镇番县志》卷四《水利考》按语。

⑯王建革：《河北平原水利与社会分析》（1368—1949)，《中国农史》2002 年 2 期。

⑰石玉林等编著《中国宜农荒地资源》281 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年。

⑱冯绳武主编:《中国自然地理》273 页，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⑲施雅风总主编：《气候变化对西北华北水资源的影响》，27 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年。

⑳㉘《甘肃新通志》卷 10《舆地志• 水利》。

㉑㊳《清经世文编》卷 114 工政二十，陈宏谋：《饬修渠道以广水利疏》。

㉒㉜㊵㊶《甘肃新通志》卷 7《舆地志• 山川下》。

㉓《五凉全志• 永昌县志• 地理志• 水利》。

㉔《甘肃新通志》卷 89《艺文志》引苏宁阿《引黑河水灌溉甘州五十二渠说》。

㉕《甘肃新通志》卷 89《艺文志》引苏宁阿《八宝山来脉说》。

㉖《甘肃新通志》卷 89《艺文志》引苏宁阿《八宝山松林积雪说》。

㉙㊷㊹乾隆十四年《五凉全志》之《镇番县志• 地理志• 镇番水利图说》乾隆十四年刻本。

㉚《清圣祖实录》卷 260，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壬申。

㉛《清世宗实录》卷 60，雍正五年八月壬子。

㉝《清高宗实录》卷 9，雍正十三年十二月甲子。

㉞《清高宗实录》卷 142，乾隆六年五月甲子。

㉟《清高宗实录》卷 351，乾隆十四年十月。

㊱《清高宗实录》卷 647，乾隆二十六年十月辛卯。

㊲《清高宗实录》卷 994，乾隆四十年十月乙巳。

㊴尹泽生等：《西北干旱区全新世环境变迁与人类文明》，载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265，277 页，海洋出版社 1993 年。

㊸《甘肃新通志》卷 88，岳钟琪《建设肃州议》。

㊺《清经世文编》卷 114《工政二十》，梁份《茹公渠记》